

# 明清韩城县举业兴盛之因及社会影响

## ——基于方志记载的考察

李世忠 段琼慧

**提 要:** 明清时期陕西韩城县实施的科举教育取得了极大成功,究其因与韩城自古以来名人乡贤之影响、民间重教风习之弘扬有关,与明清以来韩城历任县令重视举业及韩城籍官员反哺家乡教育等因素有关,更与韩城士子刻苦攻读、转益多师的态度及学习方法大有关系。举业兴盛,使得地处西北一隅的韩城成为明清两代为国输才之大县,这些人以科举晋身步入官场后,多清正廉洁、政声卓著,对国家政治生活、教育发展作出贡献,对当时的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 韩城 科举 兴盛 乡贤 吏治

陕西韩城本西周韩侯国故地,隋代已置县,其地古文献屡有载录,如《左传·僖公十五年》载“晋侯与秦伯战于韩”<sup>①</sup>;《诗经·韩奕》有“溥彼韩城,燕师所完。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sup>②</sup>之句;酈道元《水经注》亦有“圣水又东南,径韩城东”之记,该书又引《诗经·韩奕》郑玄注“周封韩侯,居韩城”<sup>③</sup>;唐李泰编《括地志》也说:“韩城在同州韩城县南十八里,古韩国也。”<sup>④</sup>明清时期,韩城以举业兴盛、硕彦奇杰代生而成关中名区,如清康熙时韩城令康行侗在《韩城县续志》序言中说:“韩之为乡贤者众矣”,“人士代出,未有艾也”,该书《风俗志》中又说韩城“制科浸盛,仕宦崇高,洋洋乎大国风矣”<sup>⑤</sup>。清初陕西巡抚鄂海也称韩城“文才武艺、高士贞媛有待于传之简端者,更仆难数”<sup>⑥</sup>。因士风醇茂、举业兴盛,使得韩城县在明嘉靖后几乎形成了户尽可封的现象。那么,形成韩城举业兴盛的因素究竟有哪些方面?举业的兴盛,又对当时国家吏治、社会文化发展等产生了何种影响?本文试对此予以探讨。

### 一

明代马理、吕柟纂《陕西通志》<sup>⑦</sup>,清沈青崖等纂《陕西通志》<sup>⑧</sup>及傅应奎纂《韩城县志》<sup>⑨</sup>等志书中,对明清陕西韩城县的科举情况均有详细记录。据载,明277年间陕西所属95县共出进士954人、举人1524人、贡士1463人,三者合计每县年均考取0.15人。而韩城全县人户

①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72页。

②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227页。

③ 酈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第302页。

④ 李泰著,贺次君辑校:《括地志辑校》,中华书局,1980年,第30页。

⑤ 康行侗纂:《韩城县续志》,康熙四十二年(1703)木刻宋体版手抄本。

⑥ 康行侗纂:《韩城县续志》,“序言”,康熙四十二年木刻宋体版手抄本。

⑦ 参见赵廷瑞修,马理、吕柟纂:《陕西通志》,嘉靖二十一年(1542)刻本。

⑧ 参见沈青崖等纂:《重修陕西通志》,雍正十三年(1735)刻本。

⑨ 参见傅应奎修,钱坫等纂:《韩城县志》,乾隆四十九年(1784)刊本,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

2410, 丁 15840<sup>①</sup>, 人口数量在当时陕西各州县不占优势, 同期却出进士 32 人、举人 146 人、贡士 151 人, 年均 1.2 人, 是陕西其他州县近十倍。清代初期, 韩城人口总量大幅度增加, “城内及四乡土著并寄籍共三万八千四十七户, 男妇大小一十九万九千三百二十六名口”<sup>②</sup>。人口增加, 举业亦呈迅猛发展势头。如从清初至雍正十一年 (1733) 的 89 年中, 陕西 86 县 (州厅) 共出进士 407 人、举人 1794 人、贡士 482 人, 合计年均每县考取 0.36 人, 韩城同期则出进士 30 人、举人 87 人、贡士 61 人, 达到年均 2 人<sup>③</sup>, 尤其进士人数, 韩城是同期陕西其他州县 6 倍之多。这说明入清后, 韩城通过科举为国育才总量仍居陕西乃至全国前列。同时, 该县出现的“一母三进士”、祖孙巡抚、父子御史、兄弟侍郎等家族人才兴盛现象, 更广为人知。察其原因, 主要与以下因素有关。

首先, 名人乡贤事迹的影响及重教传统的弘扬起到了关键作用。

韩城自古就有重教传统, 正如编纂今存最早《韩城县志》的明代户部尚书、韩城人张士佩所言: “韩虽一隅, 而圣哲之迹传为封疆光重者, 炳炳经传。”<sup>④</sup>《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即载录孔门十哲之一子夏“居西河 (韩城) 教授, 为魏文侯师”<sup>⑤</sup>之事; 《太平寰宇记》亦有“子夏石室”<sup>⑥</sup>的记载。乾隆十一年 (1746), 韩城令郑仔撰《创建先贤子夏祠记》说子夏后人居住在韩城县卜家村及西泽村, “率皆敦厚朴质, 建祠祀其祖子夏”<sup>⑦</sup>。

悠久的崇文重教传统, 使得韩城自古人才辈出。春秋时期的程婴、韩厥, 战国时期的司马错, 秦汉时期的董翳及司马谈、司马迁父子, 南北朝时薛的麟驹父子, 唐代白居易家族, 后周时薛端、薛裕兄弟, 宋代宰相张昇等, 都出身韩城。尤其是司马迁, 自西晋永嘉四年 (310) 汉阳太守殷济修建其墓葬于韩城梁山后<sup>⑧</sup>, 历代任职韩城官员及当地民众即不断增修、祭拜或题咏其祠庙, 由此形成了祭拜太史公的习俗。如明嘉靖十五年 (1536) 郭宗傅撰《重修司马公祠记》说: “岁时, 则镇之父老率子弟而祠飨焉, 盖旧俗也。”<sup>⑨</sup>明天启七年 (1627) 进士、韩城人解引樾作诗也说: “汉家宫阙草芊芊, 下里犹闻记史迁。”<sup>⑩</sup>明清时期, 韩城所以能成为“家诗书而户礼乐”<sup>⑪</sup>、“礼仪之遗泽深”, 而“士尚廉耻”的“忠厚之邦”<sup>⑫</sup>, 像司马迁这样文源深广的乡贤, 对该地崇文重教风习的承传实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其次, 明清以来历任县令对当地文教事业的重视, 也促成了韩城举业的兴盛。

明清时任职韩城官员普遍重教。表现之一, 几乎每任县令都关心学宫及书院建设。据县志载, 自洪武四年 (1371) 至康熙十八年 (1679), 有碑记载录的学宫重大修缮及增建有 12 次。除学宫外, 该县还建有众多书院, 著名者如龙门、少梁、古柏、萝石、灵芝等书院, 其创建与维

① 据清乾隆四十九年刊毕沅、傅应奎纂修《韩城县志》记载统计, 参见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 1976 年版《韩城县志》, 第 56—57 页。

② 冀兰泰修, 陆耀遹纂:《韩城县续志》, 清乾隆四十九年原刊本嘉庆二十三年 (1818) 续修, 第 91 页。

③ 据傅应奎纂《韩城县志·选举志》及沈青崖等纂《敕修陕西通志·选举志》统计。

④ 张士佩、苏进纂:《韩城县志》卷 6, 万历三十五年 (1607) 木刻版手抄本。

⑤ 司马迁:《史记》, 中华书局, 1959 年, 第 2203 页。

⑥ 乐史著:《太平寰宇记》, 中华书局, 2007 年, 第 601 页。

⑦ 傅应奎修, 钱坫等纂:《韩城县志》, 第 716—717 页。

⑧ 参见酈道元著, 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 第 105 页。

⑨ 傅应奎修, 钱坫等纂:《韩城县志》, 第 608 页。

⑩ 李世忠著:《历代咏关中陵墓诗笺注》,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3 年, 第 250 页。

⑪ 康行侗纂:《韩城县续志·序》, 康熙四十二年木刻宋体版手抄本。

⑫ 赵本荫修, 程仲昭纂:《民国韩城县续志》, 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 1976 年石印本, 第 117 页。

护均凝聚着县令心血。如康熙三十八年（1699）到任韩城令的康行儻，任职7年间在县内各地建义学5所；乾隆五十二年（1787）任知县的傅应奎，对汪平书院的选址与结构布局费尽心思：

城中旧有龙门书院，地傍市井，甚非课士之所，又以童试时同僦县署，自备文几，既苦负担，亦非体统，因于萝石、少梁诸书院告成后，创建于兹。……斋房之制自省会以及郡县书院，率皆东向、西向依次直列，公以为不便肄业，设东西两斋共二十四间，俱南向。每所三间，中间牖，各北向，冬夏咸宜。<sup>①</sup>

傅应奎由此赢得民众拥戴，书院落成之日人们遂用他的别号“汪平”给书院命名。

表现之二，县令亲自筹集办学经费乃为常态。如康熙三十八年任韩城知县的山西安邑人康行儻，因其以“诸生起家，习知寒儒应举之艰”，乃捐金置买学田；<sup>②</sup>雍正时韩城令刘方夏“倡捐银四百四十八两零，典买地十五亩八分，房院一所”<sup>③</sup>；傅应奎令韩期间，亦“倡众捐金八千余金，置地二百七十亩，市房五座，取租银七百一十两，为师生产膏火束脩之资”<sup>④</sup>。因当地执政者“乐育曲成，使肄业有所，童试有其地，诸生膏火有所资”<sup>⑤</sup>的努力，遂使韩城举业发展有了物质保障。

表现之三，县令身体力行、亲自督课士子读书成为当地治政风气之一。如嘉靖二十三年（1544）任韩城令的王翰不仅“聚英才而督课之”<sup>⑥</sup>，还在芝川张士佩读书精舍题联：“两岸交成文字水，一川种出甲科材”，以鼓励其刻苦攻读，“书后八年，佩果叨第”而成一代名宦。其他所督士子，亦群英璀璨，“有若知府薛承范、张元善焉，有若同知贾缘焉，有若知州薛同术焉，有若通判孙从教焉、张元宾焉、张九思焉，有若知县程輿焉”，一时才士济济。王翰离任后，韩城“风教犹然袭人”<sup>⑦</sup>，此后不到百年，该县考中进士26人。

除王翰外，其他如明末韩城令左懋第也亲自教授诸生学习，他“社日率都人士讲义读书……朔望日亲至明伦堂课其勤惰，如严师然”，“韩人知通经学古，实自公始。丙子登科者八人，皆社中士”<sup>⑧</sup>。清代韩城令吴曹直也常“聚百姓，亲为讲说”，“邑故多妓，子弟每沉溺荡产，立驱之境外。……勤季考，设敦行、学古诸社，月必三课，手定甲乙丙”。吴卸任后，接任韩令的向日升亦“培士气，勤考课，与吴令媲美”<sup>⑨</sup>。此外，福建人唐桂生令韩六载，也“持大体，端风化，乐育人材”<sup>⑩</sup>。这都说明韩城举业的兴盛，实与历任县令的重教努力有莫大关系。

复次，走进官场的韩城籍士人对家乡举业的反哺也促进了当地文教事业发展。

明清两代，通过科举之路入仕的韩城籍官员人数众多，他们走进官场后大多依然重视家乡教育发展。反哺方式，首先是物质资助。如隆庆五年（1571）进士薛亨“迁楚副宪，过家……置义田义学义冢，贤愚僉受其益”。后来，他再“迁四川参政，治涪，大修学宫。而韩亦修学，以

① 傅应奎修，钱坫等纂：《韩城县志》，第100页。

② 傅应奎修，钱坫等纂：《韩城县志》，第704页。

③ 傅应奎修，钱坫等纂：《韩城县志》，第98页。

④ 傅应奎修，钱坫等纂：《韩城县志》，第100页。

⑤ 傅应奎修，钱坫等纂：《韩城县志》，第101页。

⑥ 傅应奎修，钱坫等纂：《韩城县志》，第215页。

⑦ 傅应奎修，钱坫等纂：《韩城县志》，第215页。

⑧ 傅应奎修，钱坫等纂：《韩城县志》，第221页。

⑨ 傅应奎修，钱坫等纂：《韩城县志》，第225页。

⑩ 傅应奎修，钱坫等纂：《韩城县志》，第225页。

百金来助”<sup>①</sup>。万历元年（1573）举人张邦敬，从贵州布政司监军、左参政任上退归韩城后，“捐金葺学宫，置司马太史公祭田”<sup>②</sup>。康熙年间举人、韩城人张京瓚，亦“捐俸置学田，供士子科举费”<sup>③</sup>。这些人的资助，既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地办学经费的不足，对后学而言又是极大激励。

除物质资助外，退休或返乡归里的韩城籍官员及士人，亦积极投身乡梓教育。形式有二：一是课读本族子弟，二开馆授徒。前者如万历间进士解经传，卸任归乡后“闭门教子孙”，直至耄耋之年；<sup>④</sup> 后者如“端正好学、善古文”的万历六年岁贡刘自新，“升东城兵马，以不谐俗罢归里居，读书教授者四十年”<sup>⑤</sup>；其他明崇祯四年（1631）岁贡生张进昌，平生为官于四川、重庆等地，返乡遇“闯变后隐居不出，日闭户读书，诸生受学者甚众”<sup>⑥</sup>；万历四年举人、曾任山西榆社知县的韩城人吴永图，以同情百姓贫苦“考居下第”，返乡后也“性好悔人孜孜不倦”，“自呼农逸者四十九年，年九十一卒”，去世后韩城令左懋第为之撰墓铭，称其“有道仁人”。<sup>⑦</sup> 另外，也有韩城籍士子学成后，因失意于官场而就地授徒，这也成为催兴本地举业的重要力量。如明代解惟一“屡试不中”，“乃开馆授生徒，日夜训迪。……门下士近百余人，远迩负笈者，为筑精舍居之”<sup>⑧</sup>。

最后，在重教风气影响下，韩籍举子的苦读苦学及转益多师也成为本地举业兴盛的重要原因。

志书载，明代韩城郝庄里人薛亨，“十八隶诸生籍，家赤贫，读书圆觉寺”，寺庙里的僧人夙夜起鸣钟，每闻其书声，也不禁感叹：“吾党苦行，不若是”，因他“寒忘求衣，馁忘求食”，读书几近痴迷，嘉靖四十年（1561）应乡试为秦地第一人，后终成进士；<sup>⑨</sup> 明代卫先范，“家酷贫，读书砥砺不稍休，赖仲兄先烈衣食之”，也终成进士；<sup>⑩</sup> 明崇祯时期李化麟，“少有文誉，家贫，常佣书里中”，也终成进士；<sup>⑪</sup> 解惟一，“少读书圆觉寺，独坐一室，手不释卷，补邑诸生，益肆力学问”；<sup>⑫</sup> 卫王道，“邑诸生，治易……家酷贫，环堵萧然，处之自如”<sup>⑬</sup>。丁荫璧，“贫而嗜学，每有会意处，辄欣然忘食，文名藉邻邑”<sup>⑭</sup>。孙龙竹，“幼失怙，家贫。……潜心汲古，每至废寝食，及门诸英俊，莫之能先”<sup>⑮</sup>。还有八岁丧父、家境贫寒为人牧羊的王杰，以苦学而终成清代唯一陕西籍文状元，后官至东阁大学士、总理礼部加太子太傅，等等。先贤的榜样，优良的重教传统，以及政府的重视、先行者的反哺，使韩城士子从中获得了发奋苦读的精神力量。故从明至清，苦读之风代代相传，这对韩城跻身全国科举大县起到了重要作用。

韩城士子除在本乡本县刻苦攻读外，不少人也远走他乡拜师求学、转益多师以广采博闻，“京洛之间，足迹殆遍”。如明代正统年间举人、曾任四川夔州府同知的孙辂，“从学河东薛文清

① 傅应奎修，钱站等纂：《韩城县志》，第335—336页。

② 傅应奎修，钱站等纂：《韩城县志》，第339页。

③ 沈青崖等纂：《敕修陕西通志》卷62，雍正十三年（1735）刻本。

④ 傅应奎修，钱站等纂：《韩城县志》，第342页。

⑤ 傅应奎修，钱站等纂：《韩城县志》，第363页。

⑥ 傅应奎修，钱站等纂：《韩城县志》，第364页。

⑦ 傅应奎修，钱站等纂：《韩城县志》，第362页。

⑧ 傅应奎修，钱站等纂：《韩城县志》，第370页。

⑨ 傅应奎修，钱站等纂：《韩城县志》，第334页。

⑩ 傅应奎修，钱站等纂：《韩城县志》，第344页。

⑪ 傅应奎修，钱站等纂：《韩城县志》，第356页。

⑫ 傅应奎修，钱站等纂：《韩城县志》，第370页。

⑬ 傅应奎修，钱站等纂：《韩城县志》，第371页。

⑭ 傅应奎修，钱站等纂：《韩城县志》，第379页。

⑮ 傅应奎修，钱站等纂：《韩城县志》，第380页。

公之门”<sup>①</sup>。薛文清即明代著名思想家、理学家、文学家，开创“河东之学”的河津人薛瑄。除孙轸外，明成化间进士王盛也曾受业于薛瑄；<sup>②</sup>又如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张邦俊，“出邹泗山先生之门”<sup>③</sup>。邹泗山即万历十一年进士、历官翰林院充经筵日讲官，久负盛名的江西安福人邹德溥；另外，与张邦俊同年进士及第的卫先范，“出新安吕忠节豫石先生之门”<sup>④</sup>。吕忠节，即担任过南京兵部尚书，后在洛阳设立“伊洛会”广招门徒、著书立说的著名理学家吕维祺。其他又如清初岁贡生高世弼，“长游李二曲先生之门”<sup>⑤</sup>，同时受业二曲者除高世弼外，还有贡生贾缔芳、生员程藻都是韩城人，而李二曲即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哲学家、陕西盩厔人李颙。正因这些韩城士子们转益多师、学有根底，从而使得他们能够在科考中所向披靡。

## 二

明清时期韩城县举业兴盛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是显著的。

首先，兴盛的举业使得韩城作为西北地区人口小县，而成为为国输才之大县，且这些人走进官场后，大多清正廉洁、政声卓著，对国家政治生活、教育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如明末进士李化麟，顺治初授给事中，“居恒谦厚接物，至大义所在，不可干以私。有罪犯应死者持白金求营脱，严斥之曰：杀人者死，天可欺乎！”<sup>⑥</sup>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阎可陞历任给事中等要职，“为人方严，正色立朝，抗直敢言，风节甚著”<sup>⑦</sup>；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张邦俊历任云南布政司、左参政、御史等职，“抗言起废弃，广用贤”<sup>⑧</sup>；而兄弟五人皆举业有成的解经雅，为官“以不阿为时忌”<sup>⑨</sup>；万历元年举人张邦敬为官“以循良称”<sup>⑩</sup>；嘉靖四十三年（1564）举人程时建“任莱阳令，创修邑志，多惠政，志名宦祠”，其政声传至家乡，数十年后左懋第任韩令祭祀时称“惟公而直，直则惠焉”<sup>⑪</sup>。

其他如万历四年（1576）举人吴永图，任山西榆社知县“均徭甦驿，兴教化，出沉狱，百姓爱戴如父。……归之日，民泣不忍舍。行李萧然，以一人担之而去”<sup>⑫</sup>；万历六年岁贡刘自新，“任邳州同知，爱民勤政，百姓爱戴之，为立祠”<sup>⑬</sup>。景泰四年岁贡孙美，“任直隶古城丞，居官严私交，廉正自矢”。任职地旧无麻，他“自韩城栽种教以树艺，沕勿法，至今世食其利，号为孙公麻”，曾“三举清廉，崇祭名宦。《一统志》云清贞刚介，一毫不取。秩满，贫不能归，士民餽钱以赈，坚辞不受”<sup>⑭</sup>；康熙二十一年进士陈朝君，“听讼明决，尝于省会一日审结十大案，台司皆器重之。”任

① 傅应奎修，钱坫等纂：《韩城县志》，第368页。

② 傅应奎修，钱坫等纂：《韩城县志》，第329页。

③ 傅应奎修，钱坫等纂：《韩城县志》，第340页。

④ 傅应奎修，钱坫等纂：《韩城县志》，第344页。

⑤ 傅应奎修，钱坫等纂：《韩城县志》，第380页。

⑥ 傅应奎修，钱坫等纂：《韩城县志》，第356页。

⑦ 傅应奎修，钱坫等纂：《韩城县志》，第344页。

⑧ 傅应奎修，钱坫等纂：《韩城县志》，第340页。

⑨ 傅应奎修，钱坫等纂：《韩城县志》，第340页。

⑩ 傅应奎修，钱坫等纂：《韩城县志》，第339页。

⑪ 傅应奎修，钱坫等纂：《韩城县志》，第361页。

⑫ 傅应奎修，钱坫等纂：《韩城县志》，第362页。

⑬ 傅应奎修，钱坫等纂：《韩城县志》，第363页。

⑭ 傅应奎修，钱坫等纂：《韩城县志》，第363页。

户部主事“有私馈，尽叱之”；<sup>①</sup>康熙五十年（1711）举人吕功，“任安县令三载而罢。……解组归，行李萧然，家徒四壁立，既乃舌耕晋土”<sup>②</sup>。此外，还有陈进昌、刘荫楫、范光炜、张云桂等韩籍官员，皆以勤政爱民、两袖清风名称当时，有的甚至因国事献出生命。如崇祯时宰相韩城人薛国观，面对灾荒及农民起义，提议向皇亲国戚借钱以助军饷，遭皇族反对，终自缢而死并被暴尸三日。

因韩籍士人多得益于本县教育而晋身仕途，所以在各自从政生涯中，也十分重视发展教育。如张士佩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中进士后任职绍兴推官，甫上任，即在当地主持修建稽山书院，并通过考试选拔数十人“教育于稽山书院，有大拜及魁天下者同考乡试，所得悉一时知名士”<sup>③</sup>；隆庆二年（1568）进士张元善，任成都府同知，“督建宗学，不受馈金”<sup>④</sup>；隆庆五年进士薛亨拔擢山西提学僉事后，“教先德而后文艺，暇则登进诸生谈经术，日昃不倦，而以斋膳之羨置学田，周士不给者”。其以母丧归韩城，“邻邑士来受业，成名者甚众。服除，除故官，值大比，士屡试不悛烦，得人为盛，所著《晋学政校士录》《晋学申论原教录》《四先生语录》《理学诗》《学海从珠》，至今诵之”<sup>⑤</sup>；张邦敬担任叙州知州，其地荒僻、文教残缺，“为刊四书五经于府学”<sup>⑥</sup>；张邦俊任御史，“疏请增浙、闽、秦、齐解额，四省各得五人，增会试额，天下得五十人，定为例”<sup>⑦</sup>；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进士张廷枢，“典试江南，其所拔识率多明宿，得人称最盛。嗣任督学，亦如之”<sup>⑧</sup>；刘荫楫担任夹江令，“首重学校，捐资重修”<sup>⑨</sup>；张云桂，任阶州训导，“力请于郡牧，置学田，立课期，日夕淬厉，文风丕变，士子登科甲者踵相接。后摄论文县侍御，何公讳宗韩甫应童子试，桂一见器重，加意栽培，卒获鹏抟”<sup>⑩</sup>。何宗韩乃雍正二年（1724）进士，历任刑部福建司郎中、大理寺左少卿等职，这位名重当时的官员正是张云桂发现并栽培。

其他如康熙二十一年进士陈朝君，“初令蒙阴，重学校。……升郎中视学中州，号称得士”<sup>⑪</sup>。雍正元年举人丁荫璧，“任凤翔教谕，尝训士子先品行而后文艺。在任数年，勤于考课，每自制一艺以为式，无不老靠切实。凤士多所造就……皆其教导之力”<sup>⑫</sup>。顺治三年（1646）贡士张鼎铨，“贡京师，授定西训，诛茅筑室，纠诸生讲业其中，尽倾先世之遗资佐供具”。其任职五原时，“士有来学者，则躬自教之”<sup>⑬</sup>等。韩籍官员治政中此类重教崇文之事不胜枚举，有的甚至上书皇帝主张尊师重教。如顺治四年进士贾宏祚撰《重师儒疏》，将重教提到改善社会风气的高度予以讨论。他说：“庠序学校之官，为兴贤育士之本，诚得人以教士，则名公巨士时时兴起其间。所云师道立而善人多，不可不汲汲也。”<sup>⑭</sup>以上这些韩籍官员，都为推动国家教育与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

其次，韩城举业的兴盛，亦极大促进了当地乃至全国社会文化的发展。

- ① 傅应奎修，钱站等纂：《韩城县志》，第361页。  
 ② 傅应奎修，钱站等纂：《韩城县志》，第378—379页。  
 ③ 傅应奎修，钱站等纂：《韩城县志》，第330—331页。  
 ④ 傅应奎修，钱站等纂：《韩城县志》，第369页。  
 ⑤ 傅应奎修，钱站等纂：《韩城县志》，第335页。  
 ⑥ 傅应奎修，钱站等纂：《韩城县志》，第339页。  
 ⑦ 傅应奎修，钱站等纂：《韩城县志》，第340页。  
 ⑧ 傅应奎修，钱站等纂：《韩城县志》，第361页。  
 ⑨ 傅应奎修，钱站等纂：《韩城县志》，第365页。  
 ⑩ 傅应奎修，钱站等纂：《韩城县志》，第366页。  
 ⑪ 傅应奎修，钱站等纂：《韩城县志》，第360页。  
 ⑫ 傅应奎修，钱站等纂：《韩城县志》，第379页。  
 ⑬ 傅应奎修，钱站等纂：《韩城县志》，第376—377页。  
 ⑭ 傅应奎修，钱站等纂：《韩城县志》，第537页。

表现之一：因举业兴盛、人才蔚盛，使得该县出现了罕见的家族人才兴旺现象，这极大地提升了韩城县在陕西乃至全国的知名度。如万历年间一门五子登科的解经雅兄弟（三进士一乡举一贡士）<sup>①</sup>；明代绛州知州张凤萧及其族侄张邦敬、张邦俊兄弟（后二者一为贵州布政司左参政，一为云南布政司左参政），及万历举人张邦敬祖孙三代（子张进昌举明经，孙张鼎铨贡京师）；嘉靖间进士张士佩及其“登乡荐，三中会副，驰名艺苑”的从弟张士魁<sup>②</sup>；还有双双进士出身，且均官至御史的明末清人初卫楨固、卫执蒲父子，以及关中著名易学家卫王道及其子卫先范<sup>③</sup>，官至陕西道御史的清顺治四年（1647）进士贾宏祚及其子、著名学者贾缙芳<sup>④</sup>。另外，康熙朝双双进士出身的江安督粮道张颐行与其子张廷枢（曾任刑部尚书），康熙朝进士、政声卓著的刘荫枢及其弟刘荫楫等。而一村出多位进士的现象也被传为佳话，如嘉靖、万历年间进士薛亨、薛芳、薛贞，都出自韩城涧南村薛姓，他们主要的任职时间都在万历朝中前期。

表现之二：举业兴盛，使得韩籍士人也多以擅长著书立说名盛一时，而他们文集的刊刻传世更产生了广泛影响。据乾隆《韩城县志》载，明代至清初韩城士人著作传世者78种，有诗文别集被刊刻传世的作者22人。<sup>⑤</sup>突出者，如嘉靖年间进士张士佩，“平生笃信理学”，著述宏富，所著《六书赋》《达意稿》《四书端蒙》《中庸大指》《洪武正韵玉键》等，“皆畅发前贤之旨”<sup>⑥</sup>，今存最早的《韩城县志》即为其所著。张士佩从弟张士魁，亦“驰名艺苑，兼善古文，辞藻赡典蔚然”<sup>⑦</sup>。其他如有诗集传世的万历四年乡荐梁元，“博学善古文，工诗赋，著述甚多”<sup>⑧</sup>。天启年间进士解引樾，“雄才博学不可一世”，其文“海内翕然诵之”，“执经请业者，趾相错也。所著有《素位篇》《华游草》《名胜志》《澹园稿》等书”<sup>⑨</sup>。清初进士程必升“善诗文……著有《白石堂集》”<sup>⑩</sup>。康熙五十三年（1714）举人吉庚，“学最淹博，而文则抒之以性灵，一洗尘氛之习”<sup>⑪</sup>。曾参与修纂雍正《陕西通志》、讲学龙门书院的岁贡生解含章亦“博闻淹贯”，“有《南安集》，乾隆己亥藩宪檄其诗赋入关中名稿中”<sup>⑫</sup>。还有的人，以其书法作品驰名当代。如明隆庆二年进士张元善，“以善书名世，在蜀有高大光明字刻壁，长安文昌阁、岳庙、万寿阁，传皆公笔。文名雄甚，称关中杰士，著有《紫云稿》”<sup>⑬</sup>。这些人或能文能诗，或以书法擅名，对陕西乃至当时全国的文化建设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地处西北的韩城县，其实施科举教育所取得的成功，实引人瞩目。探讨其成因，借鉴其经验，对推动我国当代地方教育发展，促进乡村文化建设实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咸阳师范学院）

本文责编：周全

- ① 参见傅应奎修，钱坫等纂：《韩城县志》，第340页。  
 ② 参见傅应奎修，钱坫等纂：《韩城县志》，第370页。  
 ③ 参见傅应奎修，钱坫等纂：《韩城县志》，第371页。  
 ④ 参见傅应奎修，钱坫等纂：《韩城县志》，第356页。  
 ⑤ 参见傅应奎修，钱坫等纂：《韩城县志》，第782—785页。  
 ⑥ 傅应奎修，钱坫等纂：《韩城县志》，第331—332页。  
 ⑦ 傅应奎修，钱坫等纂：《韩城县志》，第370页。  
 ⑧ 傅应奎修，钱坫等纂：《韩城县志》，第369页。  
 ⑨ 傅应奎修，钱坫等纂：《韩城县志》，第372—373页。  
 ⑩ 傅应奎修，钱坫等纂：《韩城县志》，第377页。  
 ⑪ 傅应奎修，钱坫等纂：《韩城县志》，第378页。  
 ⑫ 傅应奎修，钱坫等纂：《韩城县志》，第382页。  
 ⑬ 傅应奎修，钱坫等纂：《韩城县志》，第369页。